

# 试论凯南的“遏制” 与杜勒斯的“解放”

\*\*\*\*\*张 小 明\*\*\*\*\*

“遏制”和“解放”都是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实施的主要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略。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 1904—)是“遏制”的鼻祖,而约翰·F·杜勒斯(John F. Dulles, 1888—1959)则是“解放”的主要鼓吹者。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是对立的还是相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 一、“解放”是作为“遏制” 的对立面提出来的

乔治·凯南是在1947年7月号《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中,比较完整地阐述其“遏制”战略思想的。凯南的“遏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地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sup>①</sup>凯南的“遏制”思想实际上成为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制订对苏及其盟国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战略因此被称为“遏制”战略,凯南也因而获得“遏制之父”的雅号。虽然凯南的“遏制”思想同杜鲁门政府所推行的“遏制”战略并不十分一致,而且凯南对杜鲁门政府的某些对苏政策有较多的批评,但是凯南的名字及其“遏制”思想是同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1952年美国大选期间,艾森豪威尔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发言人杜勒斯,多次发表演说和文章,攻击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指责它是“消极的、注定要失败的、不道德的”战略,因为“遏制”战略承认战后现实,承认苏联对“被奴役人民”的统治。他提出应以“解放”政策取而代之。<sup>③</sup>在1953至1959年担任国务卿期间,杜勒斯多次攻击“遏制”战略,鼓吹“解放”政策。简言之,杜勒斯的“解放”是作为凯南“遏制”的对立面和替代物提出来的。

①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外交》季刊1947年7月号。

② 托马斯·帕特森:《对付共产主义威胁》(Thomas Paterson,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纽约1988年版,第130—131页。

③ 路易斯·格尔森:《约翰·F·杜勒斯》(Louis Gerson, John Foster Dulles),纽约1967年版,第70—71页。

“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师凯南也屡次发表言论，抨击有关“解放”的论调。1952年4月，他在出任驻苏大使前夕，针对共和党关于“解放”与“推回去”的言论，表示反对任何颠覆它国政权之企图。<sup>④</sup>翌年1月16日，即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阐述其“解放”思想的第二天，凯南在宾夕法尼亚律师协会发表演说，对“解放”与“推回去”政策之可行性表示怀疑，认为“解放”的成功性很小。次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凯南说‘杜勒斯政策很危险’》的文章，报道和评论了凯南的这次演讲，并声称凯南反对即将出任国务卿的杜勒斯之“解放欧亚被奴役人民”的政策。<sup>⑤</sup>尽管后来凯南给杜勒斯一封表示道歉的信，解释说不知道杜勒斯在国会的证词，声称自己的演说不是针对杜勒斯的，<sup>⑥</sup>凯南的这次讲演以及《华盛顿邮报》对此的过分渲染，还是大大地影响了他同杜勒斯的关系。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凯南同民主党杜鲁门政府“遏制”战略的关系），杜勒斯没有任用凯南这位国务院头号“苏联通”，凯南因而脱离政界，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与讲学。在1953至1959年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除了1953年4月凯南应杜勒斯的要求向他谈了自己对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认识，以及1954年给杜勒斯起草一份关于拉美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讲话稿，杜勒斯没有向凯南征询有关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方面的意见与建议。<sup>⑦</sup>

不管是杜勒斯攻击“遏制”战略，还是凯南指责“解放”论调，或是杜勒斯冷落凯南，都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凯南和杜勒斯的对苏及其盟国的战略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是互不相容的。

## 二、“遏制”与“解放”的基本目标一致

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有所不同，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杜勒斯“解放”政策主张的目标最清楚不过了，即“解放”受苏联“奴役”的人民。具体说来就是要把苏联的影响从主要包括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回去”，同时也要努力改变苏联的现存制度，“解放”苏联人民本身。如1952年5月19日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美国的目标不能“仅仅是把苏联共产主义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美国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恢复至今受莫斯科控制的亚洲和欧洲国家的真正独立，我们不参与旨在承认苏联在对它目前控制下的国家的独裁统治之行为”。<sup>⑧</sup>在杜勒斯看来，“遏制”不同

④ 戴维·迈耶斯，《乔治·凯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困境》（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the Dilemma of U.S. Foreign Policy），纽约1988年版，第196页。

⑤ 乔治·凯南：《回忆录1950—1963》（George Kennan, Memoirs 1950—1963），波士顿1972年版，第205页。华尔特·希克森：《乔治·凯南—冷战的反对者》（Walter Hixson, George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纽约1989年版，第133—134页。

⑥ 乔治·凯南：《回忆录1950—1963》，第171—175页。

⑦ 凯南：《回忆录1950—1963》，第180页；戴维·迈耶斯：《乔治·凯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第223页。

⑧ 约翰·杜勒斯：《大胆的政策》（John Foster Dulles, “A Policy of Boldness”），1952年5月19日《生活》杂志。

于“解放”，它仅仅是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而不努力使“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正如他在1953年1月15日于国会作证时所说的：“……仅仅就地限制俄国的政策本身就是一个不高明的政策，而且它还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政策，因为一个单纯防御的政策绝对敌不过一个侵略的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政策是原地不动，我们将被击败。只有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sup>⑨</sup>

凯南提出的“遏制”概念，光从字面上理解，是指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正是杜勒斯对“遏制”含义的解释。但是，从凯南的言论与主张来看，“遏制”的目标比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一含义要广得多。归纳起来说，凯南“遏制”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sup>⑩</sup>一是阻止苏联在战后进一步扩张其势力，将其影响限制在二战结束时的范围内，维持战后现状。为此凯南主张美国要“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以及“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sup>⑪</sup>凯南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特别强调“遏制”的这一层次目标，重点是防止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战后初期处于混乱状态的西欧和日本落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从这个层次的目标来看，“遏制”是防御性的、被动的和维持现状的。但是，这仅仅是“遏制”的一个目标，更确切地说是“遏制”战略第一个阶段的目标。第二个层次是促进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大大削弱苏联的力量。自从1948年夏苏南公开分裂之后，凯南不断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促进苏联同其东欧盟国的矛盾。<sup>⑫</sup>1961年凯南出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致力于鼓励东欧国家的独立倾向。凯南从未认为东欧应受苏联的控制，也不承认欧洲分裂是永久性的。相反，他在1949年7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未来统一的欧洲应包括东欧国家，不应当把欧洲分裂看成是经久不变的。<sup>⑬</sup>第三个层次是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朝着西方希望的方向变化。凯南在“X”文章中说得露骨：美国要“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转化的趋势发展”。<sup>⑭</sup>1951年他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该文指出，美国所期待的未来之俄国应有下面三个特征：一是产生一个同今天美国人所了解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政府，“它在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宽宏大量、交流信息而又真诚坦率的”，不再坚持要推翻与自己不同的政权体制，不再认为外部世界对自己“居心叵测”，等等。二是不实行“极权主义”，不要对

⑨ 诺曼·格雷伯纳姆主编，《思想与外交》（Norman A. Graebner ed., Ideas and Diplomacy），纽约1964年版，第805—806页。

⑩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John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纽约1982年版，第36—37页。

⑪ 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⑫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IV），1948年第4卷，第1079—1081页。

⑬ 凯南，《回忆录1925—1950》（Kennan, Memoirs 1925—1950），波士顿1967年版，第453—454页。

⑭ 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内滥用权力。三是承认民族自决权，不要把统治强加在其他民族的头上。<sup>⑤</sup>

从上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杜勒斯“解放”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凯南“遏制”所追求的第二、三层次的目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用美国一位外交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是凯南（遏制）战略的组成部分”，因为“遏制”和“解放”的目标都是要使“苏联权力解体”。<sup>⑥</sup>凯南也承认自己同杜勒斯没有太大的分歧，在希望苏联的势力和影响所及的地区缩小这一点上，他也赞成“解放”。<sup>⑦</sup>

凯南的“遏制”同杜勒斯的“解放”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这不难理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互成了敌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斗争。美国视苏联为其（及其西方盟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削弱苏联的力量和瓦解苏联的政权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80年代末和90年初美国认识有所变化）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凯南的“遏制”和杜勒斯的“解放”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来的，其基础都是把苏联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

但是，凯南和杜勒斯对苏联“威胁”性质的认识却有所不同。诚然，作为坚定捍卫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外交家、战略家，凯南是极为敌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的。30年代初他曾主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反对美国承认苏联并同她建交，他在“八千字电报”（1946年2月）和“X”文章中对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用十分刻薄的语言进行攻击。因此，他打心眼里希望苏联政权瓦解与垮台。然而，凯南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主要把苏联当作一个追求传统目标的民族国家。在他看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是证明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外衣和扩张其影响的政治工具。从30年代中期以来，凯南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苏联是俄国传统的继承人，并以此作为分析苏联内政、外交的出发点。他认为，苏联领导人同历史上俄国的统治者一样，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境遇的原因，怀有极端的不安全感，为此敌视外部力量、维持国内“独裁”，而马列主义则为这种不安全感和维护国内“极权主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外衣，并且充当击溃对手、满足安全需要的手段。<sup>⑧</sup>简言之，凯南认为，苏联极端的不安全感和由此产生的对西方的敌视，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构成了主要威胁，“遏制”可以消除这一威胁。而作为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和律师的杜勒斯，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所谓的苏联“威胁”。他把苏联看作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非传统国家，强调美苏之间的斗争是两种制度、思想信仰不可调和的较量。1946年5月和9月，杜勒斯在长老会全国会议上声称，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sup>⑨</sup>1956年6月21日他在基瓦尼斯国际第41次年会上的演讲中说，苏联领导人希望他们的制度在全世界得到成功，

<sup>⑤</sup> 凯南：《美国与未来的俄国》，（Kennan,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外交》季刊1951年春季号。

<sup>⑥</sup> 希克森：《乔治·凯南——冷战的反对者》，第132页。

<sup>⑦</sup> 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商务印书馆1953年版，第81页；凯南：《回忆录1950—1963》，第174页。

<sup>⑧</sup> 凯南：《莫斯科使馆电报第五一一号》（“八千字电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6年第6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I），第696—709页；华尔特·艾萨克森、伊凡·托马斯：《有识之士》（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纽约1986年版，第165—171、222页。

<sup>⑨</sup> 转引自霍世亮：《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美国研究》1990年第1期。

西方与苏联的斗争是自由与专制抗衡的继续。<sup>②</sup>尽管有上述区别,凯南同杜勒斯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苏联是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遏制”和“解放”都以消除这一威胁作为自己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杜勒斯要猛烈抨击“遏制”战略,强调“解放”与“遏制”不同呢?这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政坛,竞选对手相互攻击、标新立异和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的政策以取悦选民和树立新形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作为艾森豪威尔对外政策主要设计师的杜勒斯,要努力标榜自己的对外政策具有独创性,有别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其对苏及其盟国的政策主张不是同凯南“遏制”思想密切相连的“遏制”战略的继续。另外,在5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浪潮力量颇大,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极右派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共产主义斗争不力。为了取悦右派,杜勒斯亦想通过攻击“遏制”和宣扬“解放”,使得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对此,美国一位外交史学家指出,杜勒斯口头上指责“遏制”,实际上执行了“遏制”战略,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努力获取国会右翼的支持。<sup>③</sup>

### 三、“遏制”与“解放”之 手段有较大不同

“遏制”与“解放”都是和平取胜战略。凯南一再强调苏联“威胁”主要是政治性的,所以“遏制”主要指的是以政治手段对付政治威胁。杜勒斯也认为苏联扩大其影响靠的是政治战,而不是军事征服,因此“解放”必须而且可能通过和平的过程。<sup>④</sup>但是,凯南的“遏制”强调苏联内部的自然变化,而杜勒斯的“解放”注重外部对苏联的压力。

凯南强调苏联变化的动力在于其内部。1951年凯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一点我们是确信无疑的:俄国政府在精神和实际措施上的任何巨大而持久的变革,都绝对不会主要是按外国的意愿和忠告来实现的。真正持久而又值得其他各国人民满怀希望加以欢迎的变革,必定出自俄国人民自己的主动和努力。认为历史的车轮的运转要靠外国宣传鼓动之类的活动来加以推动,从而引起一个大国各方面生活的根本变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sup>⑤</sup>同时,凯南也认为美国不是被动地等待苏联自己的变化,美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苏联事态的发展。在他看来,美国影响苏联的重要方式是“榜样”的作用。凯南在“X”文章中指出:“美国政策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不限于坚守阵地,坐以待变。美国完全可以自己采取行动去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以及主要由苏联政策决定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发展。这不仅仅是本政府在苏联和其他地方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搜集情报活动的问题,尽管这件事也很重要;而且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问题,即美国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它正成功地处理国内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能够肩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在时代的主要思潮中,它具有能够坚持自己立场观点的精神活力。只要能造成这样的

<sup>②</sup>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sup>③</sup> 迈耶斯,《乔治·凯南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困境》,第222页。

<sup>④</sup> 弗兰克·默利和西奥多·威尔逊主编,《美国外交决策人》(Frank Merli and Theodore Wilson ed., 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74年版,第290—291页;《杜勒斯言论选辑》,第1—2页。

<sup>⑤</sup> 凯南,《美国与未来的俄国》。

印象并且保持下去，苏联共产主义的目标就必然难以实现，莫斯科支持者的希望和热情必然减退，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上的负担也必然加重”。<sup>②</sup>四年之后，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说得更明白：“美国对俄国内部发展所能施加的最重要影响将依然是榜样的影响；事实真相的影响，不仅对别人而且对本身来说也是真实的”。<sup>③</sup>为了树立这么一个“真实”的榜样，他认为美国应解决自己社会的各种问题，保持健康、活力与团结，从而影响苏联及其盟国。<sup>④</sup>除了发挥“榜样”的作用之外，凯南也极力主张美国和西方要鼓励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的，民族主义力量必然使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矛盾。对于1948年夏苏南分裂，凯南欣喜万分，认为这将影响其他共产党国家同苏联的关系，包括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凯南多次敦促美国政府秘密支持南斯拉夫，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并建议一旦发生苏南军事冲突，美国就向南提供军援。他在1948年甚至提出以德国中立化换取苏联和西方国家一道从东欧和中欧撤走军队，以便东欧摆脱苏联的控制。<sup>⑤</sup>

但是，凯南强调美国和西方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和辅助性的，指出美国“是在同一个外国打交道，我们最多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对另一些必须去发挥远为重要作用的人起辅助作用”。<sup>⑥</sup>也就是说，凯南的“遏制”侧重于苏联内部的自然变化。由此出发，他反对西方一些政治家以意识形态语言和对抗手段刺激苏联和向她施加压力，认为外部压力不会使苏联发生变化。

杜勒斯也承认“解放”通常来自内部，但他强调外部可以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苏联及其同盟国的关系发生变化。1954年11月29日杜勒斯在4H俱乐部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指出：“解放通常是来自内部的。但是如果希望不断受到外界的支持，解放就更容易来自内部。关于这一点，我们正多方面在做”。<sup>⑦</sup>杜勒斯相信，美国和西方可以以压力使苏联内部感到紧张和困难，从而导致其统治结构崩溃。<sup>⑧</sup>杜勒斯也认为美国可以“通过施加压力而不是讨好来分裂苏联与其卫星国”，其中包括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促成新中国同苏联的分裂。<sup>⑨</sup>杜勒斯所指的外部压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或精神的压力，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攻势。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作证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sup>⑩</sup>为此，他建议美国政府要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国家的真正

② 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③ 凯南，《美国与未来的俄国》。

④ 凯南，“八千字电报”，《苏联行为的根源》。

⑤ 希克森：《乔治·凯南——冷战的反对者》，第81—85页。

⑥ 凯南，《美国与未来的俄国》。

⑦ 《杜勒斯言论选辑》，第136页。

⑧ 杜勒斯，《战争与和平》(Dulles, War and Peace)，纽约1950年版，第250—252，247页。

⑨ 详见约翰·加迪斯的文章：《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该文载于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6页。

⑩ 格雷伯纳，《思想与外交》，第805—806页。

独立”，美国要经常记住和提起“解放”，给“被奴役的人民”以希望。<sup>②</sup>他主张美国利用联合国、外交途径、道义压力以及“美国之音”等舆论工具，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东欧盟国）展开宣传攻势。<sup>③</sup>

二是政治颠覆活动。杜勒斯主张“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的国家”制订一项“自由计划”，以便“鼓励铁幕内那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杜勒斯的兄弟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增加了经费、人员，扩大行动范围，多次制订和实施颠覆左派政权的计划，派流亡者潜入东欧以制造动乱，组织侦察飞机进入苏联与中国的领空，等等。<sup>④</sup>

三是通过中止或批准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商务和文化关系，即施加经济压力和进行文化渗透。<sup>⑤</sup>

四是以“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促进“解放”。1954年1月初杜勒斯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旨在以核攻击力量（即“大规模报复力量”）遏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主要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正如杜勒斯自己所说的：“遏止侵略的威慑方式是自由社会愿意和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手段进行有力的反应”。<sup>⑥</sup>他所说的“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手段”意味着美国可以就自己认为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行为，主动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对莫斯科进行核攻击。与此同时，杜勒斯也提出和奉行“战争边缘”政策，即：“……我们过去曾被带到战争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而又不卷入战争的本领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够掌握这种艺术，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如果你企图从那里跑开，如果你害怕走到边缘上，你就失败了。我们……必须正视它”。他声称在1953年朝鲜战争、1954年印支战争和1954年底至1955年初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并且由于正视它和采取坚强的行动，取得了胜利。<sup>⑦</sup>

从根本上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都是心理威慑战略，企图以核攻击和战争的威胁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而不是指真正使用“大规模报复力量”和发动战争来“解放”所谓的“被奴役的人民”。但是，它们也被用来当作促进“解放”的手段，因为在杜勒斯看来，通过军事威慑等手段，不让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扩展，会对国际共产主义内部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促使其内部变革。例如，1953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中就这么声称：“不让国际共产主义取得外部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政策。这样做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利用这些人民来征服世界”。<sup>⑧</sup>

凯南强调苏联变化之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矛盾，外部的影响是有限的、辅助性的。这是

<sup>②</sup> 杜勒斯，〈大胆的政策〉。

<sup>③</sup> 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与反应〉（Dulle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 in U.S. Policy），〈外交〉季刊1957年10月号。

<sup>④</sup> 杜勒斯，〈大胆的政策〉；加迪斯，〈遏制战略〉，第157—159页。

<sup>⑤</sup> 杜勒斯，〈大胆的政策〉。

<sup>⑥</sup> 〈杜勒斯言论选辑〉，第79页；〈遏制战略〉，第147页。

<sup>⑦⑧</sup> 〈杜勒斯言论选辑〉，第214—230、517页。

因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战略家，凯南较冷静地观察了国际政治的现实，认识到美国力量的限度和美苏斗争的长期性。而杜勒斯强调外部压力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则反映了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不耐烦情绪，他们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加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变革，而对凯南所主张的主要靠西方解决自身的问题、耐心等待并以“缓和”的手段鼓励苏联内部自然变化的“遏制”主张缺乏信心。同时，杜勒斯的“解放”强调外部压力的作用，也是过高估计美国及西方力量这种思想倾向的反映。实际上，以凯南“遏制”为代表的强调苏联内部自然变化和以杜勒斯“解放”为代表的注重外部压力促进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变革的思想倾向与政策主张，共同左右着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换句话说，战后美国政府在制订对苏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时，既考虑到美国力量的限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也希望通过外部的压力促进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变化。

\* \* \* \* \*

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凯南的“遏制”和杜勒斯的“解放”都是旨在使苏联权力解体的和平战略，两者是相容的、非对立的。它们主要区别在手段的不同，即凯南的“遏制”强调苏联及其同盟国关系内部自然变化，而杜勒斯的“解放”则注重外部压力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其东欧盟国)的和平变革。由此，我们可以把凯南的“遏制”和杜勒斯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凯南语)。<sup>④</sup>

〔本文作者张小明，1962年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sup>④</sup> 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George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新泽西1954年版，第88页。该书中译本将这句话译为“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意思相同，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9页。